**经济机会、代际流动性和共同富裕：一个文献综述**

陈雅坤 张皓辰 杨汝岱 易君健

**目 录**

[附录Ⅰ 代际收入传导理论机制的扩充 1](#_Toc150445072)

[附录Ⅱ 跨国结果比较 4](#_Toc150445073)

[附录Ⅲ 附表 7](#_Toc150445074)

[附录Ⅵ 最新研究方向 13](#_Toc150445074)

#

# 附录Ⅰ 代际收入传导理论机制的扩充

 本部分对应正文中第二部分的第（二）节“理论机制的扩充”，对关于代际收入相关性基本理论框架基础上的若干丰富和扩充进行详细介绍。

（1）婚姻配偶选择机制

选择性婚配（assortative mating）是指婚姻双方的匹配不是随机的，而是基于某些个体特征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在此问题上做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Becker, 1973, 1974, 1981）。在理论上，婚姻带来的收益包括若干方面，包括夫妻二人生产上的互补性（比较优势和专业化分工），消费上的互补性（家庭内部的公共品消费），风险分担，缓解预算约束等。婚姻的不同方面的功能意味着婚姻的双方是更加倾向于正向选择性匹配还是负向选择性匹配，即个体特征更相似的人之间进行匹配，还是个体特征差异更大的人之间进行匹配。[[1]](#footnote-0)

实证证据表明，婚配市场上的匹配主要表现为正向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收入水平类似的个体组建家庭进一步固化了收入阶层，降低了收入流动性。Kremer（1997）发现在美国，配偶双方在受教育年限上的相关程度达到了0.6以上；Haider（1998）也发现配偶双方的小时工资率的相关性达到0.3以上。另外，已有文献普遍发现，相比与男性，选择性婚配在女性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女性配偶的收入与女方父母收入间的相关性几乎与女方自身收入与其父母收入间的相关性一致（Atkinson et al., 1983; Altonji and Dunn, 1991; Lillard and Kilburn, 1995; Chadwick and Solon, 2002; Blanden, 2005）。

（2）家庭生育决策

基于数量-质量权衡理论（Becker and Lewis, 1973; Becker and Tomes, 1976），随着子女数量增加，提高子代平均人力资本水平（质量）的边际成本增加。所以孩子数量多的家庭，平均到每个孩子身上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少，从而导致子代平均质量下降，例如表现为成年收入下降。

通常情况下，观测到的子女质量对于家庭收入的弹性较高，而子女数量的收入弹性较低，甚至为负。Beckern and Tomes（1976）将子代个体禀赋的异质性纳入模型，得到了类似结论，并且进一步表明，随着父母收入增加，子女质量的收入弹性下降，而子女数量的收入弹性却增加，因此可能出现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数量随着收入增加而下降，而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数量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

此外，Becker and Tomes（1976）将数量-质量权衡理论与社会流动性相结合，提出子女数量与社会流动性负相关，而子女质量（由禀赋和人力资本投资共同决定）与社会流动性正相关。基于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家庭调查（Kiser and Whelpton, 1951）也证实了这一结论。近些年来的实证结果也表明，低收入家庭的生育率普遍高于高收入家庭，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也显著高于发达国家（Adsera, 2005）。Yu et al.（2021）以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作为准实验（quasi-experiment），发现生育数量的下降会导致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下降。由于实施力度、惩罚的可信程度等方面的城乡和地区差异，该政策对于低收入家庭的生育决策限制更弱，其生育率下降幅度小，因此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间扩大的生育率差距强化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平等水平，从而放大了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据估计，独生子女政策可以解释近几十年间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下降的40%左右。

（3）物质财富直接转移

父代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在子代收入上的边际回报是下降的，与之相比，物质资产的直接投资可能边际回报下降更慢，基于这样的前提假设，随着子代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当其边际收入回报等于物质资产回报率后，父母会选择直接将物质资产赠与子代，而不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Becker and Tomes, 1986）。研究代际财富相关性的文献也证实了这一机制（Stiglitz, 1969; Boserup et al., 2013）。

此外，Becker and Tomes（1976）认为在同一家庭中，财富的直接转移缓解了由于子代禀赋差异而导致的子代收入不平等程度。一方面，因为禀赋高的个体的投资边际产出更高，所以为了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平均成本，父母倾向于为禀赋高的子女进行更多的投资，从而加剧了兄弟姐妹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为了弥补禀赋的劣势，父母会给予禀赋低的子女更多的非人力资本（物质资产）投资，从而降低了兄弟姐妹间财富的不平等程度（相对于收入）。关于父母根据不同子女的初始禀赋进行的投资的配置，是强化（reinforce）还是弥补（compensate）了子女之间的人力资本及收入水平差异，Almond and Mazumder（2013）对既有文献进行了回顾。在中国， Li et al.（2010）利用双胞胎调查数据，结合“上山下乡”的历史事件，对父母在不同子女之间配置物质财富的直接转移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在理论和实证上区分了利他（altruism）、偏爱（favoritism）和愧疚（guilt）三种情感动机在这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4）政府转移支付和公共财政支出

在存在信贷约束的情况下，富裕家庭孩子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所以投资的边际收入回报更低。基于此，如果将高收入家庭的部分财富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形式转移到低收入家庭，则可以提高社会整体的代际流动性（Becker and Tomes, 1986）。Chetty et al.（2017）的发现支持了该观点：近几十年间美国的绝对收入流动性下降主要是由于收入分配结构更加不平等导致的。如果保持GDP增长率与现实一致，但各收入百分位的家庭收入分配比例与1970年一致，则绝对收入流动性的下降幅度可以达到71%；相反，如果收入分布比例与现实一致，但是GDP增长率提高到40—70年代的平均水平，则绝对收入流动性仅下降29%。因此，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需要更加完善的再分配机制。

此外，Solon（2004）提出政府政策对于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代际影响，取决于这些政策所偏向的收入阶层。假设相同数量的教育支出，可以用于提高面向所有人的幼儿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或者用于提高针对少数人的私立高等教育。很明显，前者对于较低收入群体的福利促进作用更显著，从而更有利于代际收入流动性提高。除了教育支出，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有关其他人力资本的公共政策，比如医疗保健，以及帮助父母平衡工作和生活的法规和政策。Black et al.（2013）也指出，北欧国家普遍较高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主要是由于更加集中的收入分布，或者是由于儿童抚育和教育相关的公共政策使得教育机会更加平等。

公共资源配置不当的情况下，公共资源总量的增加可能反而加剧代际收入不平等。例如，Li et al.（2013）发现，在公共财政支出存在错配的情况下，代际收入的相关性随着政府教育支出的增加而增加。类似地，Fan et al.（2021）发现，随着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和大学扩张，收入底部20%的家庭的孩子的收入排序反而下降，这是因为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降低了贫困家庭的孩子进入精英大学的可能性。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即助学贷款和奖学金等帮扶项目应进一步加强对低收入家庭的针对性和倾向性，同时要着力缩小公共教育质量的地区和城乡差距。

（5）预期寿命的不平等水平

一般而言，来自富裕家庭的个体享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更好的健康状况，从而具有更长的工作年限和在单位时间内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积累更高的终生收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收入不平等水平。此外，预期寿命会影响父代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从而影响代际流动性。例如，Jayachandrann and Lleras-Muney（2009）发现1946—1953年间斯里兰卡产妇死亡率的下降提高了女性的预期寿命，进而显著提高了女性相比于男性的识字率和受教育年限。

早期文献认为，当个体收入超过某个临界值时，预期寿命不再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但Chetty et al.（2016b）发现在美国的整个收入分布上并不存在这一临界值。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收入底部1%和顶部1%的预期寿命差距分别为14.6年和10.1年。而且，预期寿命的不平等程度随时间增加。2001—2014年间，收入顶部5%的男性预期寿命延长2.34年，女性2.91年；而收入底部5%，分别为0.32和0.04年。而且，Chetty et al.（2016b）发现低收入个体的预期寿命和健康行为（比如吸烟、肥胖率、运动率）显著相关，而与医疗服务的可获得性、物理环境因素、收入不平等水平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等因素不相关。因此，政府倡导个体养成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提高居民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增加工作年限、提高低收入家庭终生收入水平十分重要。

#

附录Ⅱ 跨国结果比较

本部分对应正文的第四部分“跨国研究结果比较”，对该部分的内容进行展开，讨论世界各国关于代际流动性的估计，对这些估计结果进行简述和比较。早期关于代际流动性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北美和北欧地区的发达国家。近些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和数据的可得性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文章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代际流动性演变。同时，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聚焦于代际流动性的跨国比较和时间趋势，一些文献也系统地总结和对比了此前的实证文献，比如Solon（1999）、Black and Devereux（2011）关注文献中IGE的估计结果比较，而Björklund and Salvanes（2011）聚焦于家庭背景对于教育成就的影响。从总体上看，诸多文献在数据选择、指标构建、变量范围界定、偏误处理方法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此外，相较于发达国家比较完备、开放的数据来源优势，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质量更加参差不齐，估计结果波动范围更大。以下我们从数据来源、衡量指标、变量界定、偏误处理方法和估计结果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同时，本文附录Ⅲ的表A1从样本国家、数据来源、年龄段、样本数量、测算结果,以及偏误处理方法等角度对跨国的实证文献进行了列举，供读者参考。

（一）数据来源

早期文献多使用调查数据，而近些年来的文献逐渐开始使用行政数据，最常用的是税收数据与人口普查数据相结合。得益于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北欧国家的行政数据覆盖面广、时间跨度大，可使用10年以上的个体收入取均值来衡量永久收入，并且选用生命中期具有稳定收入的时间段（40岁左右），来降低衰减偏误和生命周期偏误的影响（Nybom and Stuhler, 2016; Schnelle, 2015; Eriksen and Munk, 2020）。而美国（Chetty et al., 2014a, b）、加拿大（Corak and Heisz，1999；Connolly et al.，2019）、澳大利亚（Deutscher and Mazumder，2019）等的税收数据开始年份比较晚，所以衡量子代收入时仅能选用30岁初期，这时个体收入尚未达到稳定，这可能导致低估代际收入的持续性。相比于发达国家，有关发展中国家代际流动性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研究并不多，而且由于行政数据的不可得性，代际流动性研究一般只使用调查数据或人口普查数据，比如在中国（Fan, 2016; Fan et al., 2021; Yu et al., 2021）、拉丁美洲（Yavuz et al., 2019）、非洲（Alesina et al., 2021）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

（二）衡量指标

已有文献多以收入作为主要的结果变量。此外，部分文献使用财富作为主要指标，认为家庭财富可以更加准确地代表可用于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资源，而且财富的暂时波动要小于收入（Charles and Hurst, 2003; Boserup et al., 2013）。除此以外，考虑到收入和财富的暂时性波动及其与终生可支配经济资源的偏离，另一支文献关注以受教育水平和职业选择为衡量指标的代际流动性，因为后者在个体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相对稳定，比如同是使用父亲或者母亲为双胞胎的数据，Behrman and Rosenzweig（2002）、Antonovics and Goldberger（2005）发现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的受教育年限分别平均增加0.5年和0.3年左右；此外，Bingley et al.（2009）和Pronzato（2012）发现两个估计值均在0.2年左右。

（三）变量界定

对于收入变量的界定，不同文献在多个方面存在差异。首先，文献中对于收入的定义具有较大差别，尤其是税收数据中，个体收入来源可能出现在多个申报表中。除了劳动工资收入以外，对于自主创业收入、免税利息收入、失业救助、转移支付等的不同处理会影响结果。一般而言，由于劳动工资收入一项收入不足以衡量家庭的可支配经济资源，所以仅仅使用劳动工资收入估计得到的IGE最低（Deutscher and Mazumder，2019）。其次，零收入的处理也会影响代际收入相关性的估计结果。相比之下，RRS的估计可以将零收入个体包含在内，且结果比较稳健。Chetty et al.（2014b）发现，如果将零收入个体人为赋予即使很低的收入，比如1美元，也会明显提高RRS，即排除零收入个体会低估代际收入相关性。最后，计算两代人收入时，以子代家庭收入衡量，还是仅仅选用孩子自身收入衡量，也会对结果造成影响。一般而言，由于婚配选择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性强，所以以子代家庭（自己及配偶）收入衡量的RRS更大，即家庭组建加剧了代际的收入相关性（Chetty et al., 2014b; Deutscher and Mazumder, 2019）。[[2]](#footnote-1)

（四）偏误处理方法

受限于数据质量，为了处理IGE的估计偏误，文献中常用以下方法：第一，直接使用子代和父辈的年龄及其二次项作为控制变量（Solon, 1992; Corak and Heisz, 1999; Murray et al., 2018; Yavuz et al., 2019）；第二，将样本中的子代个体年龄限制在一定区间内，比如30—40岁（Corak et al., 2014），35—38岁（Mitnik et al., 2015），40岁上下2年内（Mazumder, 2015），36—41岁（Schnelle, 2015）等；第三，使用在生命周期中较为稳定的个体特征（比如：父亲的职业和教育水平等）作为父辈收入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Nybom and Stuhler, 2016；Schnelle, 2015）；第四，使用Heckman两步法，首先使用Probit模型估计零收入个体的选择问题，基于此预测全样本的收入（Fan et al., 2021）。[[3]](#footnote-2)

（五）估计结果

从总体上看，现有研究对世界各国的代际流动性的估计结果体现出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国家之间在代际流动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根据Corak（2006）、Black and Devereux（2011）的总结，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而北欧国家（比如芬兰、挪威和丹麦）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高。被普遍接受的是，公共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的国家一般有较低的IGE，尤其是用于初等教育的公共支出更多的国家。当然，由于各国使用的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方法差异较大，国家间的比较可能存在较大误差。

第二，即使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理区域间（省份、通勤区、县等）的代际流动性也有很大差异。一般而言，农村地区的代际流动性高于城市地区，而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收入阶层固化现象往往尤为明显（Chetty et al., 2014b; Bell et al., 2023）。

第三，一国内部不同群体间呈现很强的异质性。Schnelle（2015）发现，对于挪威1950—1965年间出生的个体而言，男性代际流动性明显高于女性，男性具有较高的向上流动性和较低的向下流动性；虽然随着时间推移，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在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弱化，但是性别差距依然显著；而在美国，Mitnik et al.（2015）发现男性和女性代际流动性接近，IGE的估计值在0.4—0.5之间。[[4]](#footnote-3)此外，Chetty et al.（2014b）发现IGE的性别差异在地区之间差异性明显，与生活社区的特征（尤其是低收入、单亲家庭的比例）高度相关，且这些不利特征对于男孩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女孩。[[5]](#footnote-4)

第四，从时间趋势来看，除了少数几个国家的税收数据可以覆盖足够长的时间跨度外，其余国家的数据不足以探讨代际流动性的时间趋势。Bratberg et al.（2005）比较了挪威1950年和1960年出生的个体的差异，发现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其代际收入流动性都呈现上升趋势（男孩IGE分别为0.155和0.129；女孩IGE分别为0.221和0.126）。但是，Nybom and Stuhler（2016）却发现在瑞典，1952—1960年间，代际收入流动性呈现下降趋势，IGE从0.206上升到0.274。Chetty et al.（2017）发现，在20世纪40—80年代间，以子代收入超过父母收入的比例衡量的绝对收入流动性呈现稳定且显著的下降趋势。具体而言，该比例从40年代的90%下降到80年代的50%，且该下降趋势出现在各个收入阶层，但是中产阶级幅度最大。作者对此的解释是，由于近几十年间，美国GDP增长速率放缓，各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放慢，绝对收入流动性呈现下降的趋势。

就代际流动性变化趋势的影响因素而言，Schnelle（2015）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20世纪70年代挪威的石油产业扩张的资源冲击对于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石油产业就业比例高的地区的男性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升幅度显著高于石油产业就业比例低的地区，而女性却没有类似的变化。石油产业就业比例高的地区的男性收入分布整体右移主要是由于石油产业扩张所带来的对于劳动力需求增加导致的。在中国，Fan et al.（2021）、Yu et al.（2021，2022）分别考察了市场化改革、计划生育政策和贸易开放对于我国代际流动性变化的可能影响。

# 附录Ⅲ 附表

表A1 跨国文献比较整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 | **国家** | **数据来源** | **样本出生年份** | **子代收入年份** | **父辈收入年份** | **样本数量** | **IGE** | **排序斜率RRS** | **绝对流动性（25%及75%预期收入排序）** | **偏误处理** |
| Solon (1992) | 美国 | PSID | 1951-1959 | 1984 | 1967-1971 | 348父子对 | 0.413 |  |  | 父亲和儿子年龄作为控制变量；父亲教育水平作为收入的IV |
| Corak (2013) | 美国 | SIPP调查数据、SSA | 1964-1975 | 2003-2007 | 1978-1986 | 3251父子对 | 0.40 | 0.30 |  |  |
| 加拿大 | 税收数据 | 1963-1966 | 1997-1999 | 儿子15-19岁 | 20万父子对 | 0.26 | 0.24 |  |  |
| 瑞士 | 行政数据StatisticSweden's multigenerational register | 1960-1967 | 30-40岁 | 30-60岁 | 5.9万父子对 | 0.25 | 0.30 |  |  |
| Chetty et al..(2014a, b) | 美国 | 联邦收入税务记录，人口普查数据 | 1980-1982 | 2011-2012  | 1996-2000  | 986.8万 | 0.344 | 0.341 | 41%，58% |  |
| Mitnik et al. (2015) | 美国 | SOI-M Panel，基于SOI （Statistics of Income） Family Panel 和 OTA （Office of Tax Analysis）Panel | 1972-1975 | 2010 | 孩子15-23岁 | 1.4万 | 0.46 |  |  | 2010年子代年龄在35-38岁 |
| Mazumder (2015) | 美国 | PSID（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 1951-1965 | 40岁上下2年 | 40岁上下5年 | 1015父子对 | 0.493 | 0.333 |  | 为了处理不同个体的可观测收入年份不同：①使用平衡面板数据；②排除由父亲个体特征（如收入、年龄、教育水平、是否为黑人等）的选择效应（selection）。 |
| Corak and Heisz (1999) | 加拿大 | 税收数据 | 1963-1966 | 1995 | 1978-1982 | 38.9万父子对 | 0.131-0.242 | 0.174 |  | 使用父亲和儿子的年龄及二次项作为控制变量，对每年收入和儿子年龄施加限制 |
| Connolly et al. (2019) | 加拿大 | 税收数据，19961年人口普查数据 | 1980，1982 | 2011-2012 | 1996-2000 | 55.7万 | 0.310 | 0.212 | 44%，57% |  |
| Güell et al. (2018) | 意大利 | 税收数据 | 1972-1983 | 2011-2012 | 1998-1999 | 64.8万 | 0.22 | 0.228 | 44%，55% | 衰减偏误：①仅保留19981年父母35-55岁；②去掉2012年小于35岁的个体。 |
| Nybom and Stuhler (2016) | 瑞典 | 税收数据 | 1952-1954 | 22-47岁 | 36-65岁 | 3160父子对 | 0.206 |  |  | 父亲教育作为收入IV |
| 1955-1957 | 3444父子对 | 0.246 |  |  |
| 1958-1960 | 3427父子对 | 0.27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 | **国家** | **数据来源** | **样本出生年份** | **子代收入年份** | **父辈收入年份** | **样本数量** | **IGE** | **排序斜率RRS** | **绝对流动性（25%及75%预期收入排序）** | **偏误处理** |
| Heidrich (2017) | 瑞典 | SIMSAM (Swedish Initiative for Research on Microdata in the Social And Medical Sciences) | 1968-1976 | 32-34岁 | 1968-2010 | 77.5万 | 0.302（平均）,0.326（儿子）,0.279（女儿） | 0.198（平均）,0.238（儿子），0.206（女儿） |  | 数据年份多，17年平均收入，且均在工作年限内；数据显示，孩子收入年龄时，与终生平均收入接近；孩子出生时父母年龄分别为16-40和16-36。 |
| Bratberg et al. (2005) | 挪威 | 行政数据the Norwegian Database of Generations (DBG) | 1950 | 1981-1985 | 1967-65岁 | 儿子11.9万，女儿9421 | 儿子0.155，女儿0.221 |  |  |  |
|  | 1960 | 1991-1995 | 儿子2.4万，女儿2.2万 | 儿子0.129，女儿0.126 |  |  |  |
| Schnelle (2015) | 挪威 | 行政大数据 | 1932-1933 | 36-41岁 | 50-55岁 | 6894父子对 |  | 0.228 |  | 使用父亲的职业和居住地估计父亲收入 |
| 1952-1957 | 8.6万父子对，8.2万父女对 |  | 男性： 0.202-0.235；女性：0.140 |  |  |
| Murray et al. (2018) | 澳大利亚 | HILDA调查数据 | 1984-1986 | 2014-2015 | 2001-2005 | 489 | 0.282 | 0.273 |  | IGE回归中加入孩子和父母年龄、孩子性别虚拟变量。 |
| Deutscher and Mazumder (2019) | 澳大利亚 | 税收数据 | 1978-1982 | 2011-2015 | 1991-2001 |  | 0.107-0.192 | 0.215 | 45%，56% |  |
| Charles and Hurst (2003) | 美国 |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调查数据 |  |  |  | 1500 | IWE为0.365（不包括负财富） |  |  | 使用财富而不是收入作为永久性经济资源的代理变量 |
| Boserup et al. (2013) | 丹麦 | 税收数据 | 1960-1990 | 2009-2011 | 父母财富1997-1999 | 115.6万 | 控制父母和孩子年龄虚拟变量：IWE为0.268（不包括负财富），0.19（包含负财富） |  |  | 生命周期：按照出生年份分别做回归，IWE很稳定0.16-0.22 |
| Bell et al. (2023) | 英国和威尔士 | 行政数据Longitudinal Study of England and Wales,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 1874-1983 |  |  |  |  |  |  | 教育水平和职业作为代际流动性指标，后者基于社会学和婚配市场上常用的职业Cambridge score （分数越高，对于教育要求要高，收入越高） |
| Eriksen and Munk (2020) | 丹麦 | 行政数据 | 1973-1977 | 2010-2015 | 1980-孩子18岁 | 34.0万 |  | 0.242 | 44.1%，56.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 | **国家** | **数据来源** | **样本出生年份** | **子代收入年份** | **父辈收入年份** | **样本数量** | **IGE** | **排序斜率RRS** | **绝对流动性（25%及75%预期收入排序）** | **偏误处理** |
| Bratberg et al. (2017) | 美国 |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s 1979 调查数据 | 1957-1964 |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 1979-1981 | 6.4万 | 0.432 | 0.383 |  |  |
| 德国 | German Socio-economic Panel调查数据 | 1957-1979 | 2001-2012 | 1984-1986 | 1072 | 0.348 | 0.257 |  |  |
| 挪威 | 行政数据 | 1957-1964 | 1996-2006 | 1978-1980 | 32.8万 | 0.194 | 0.223 |  |  |
| 瑞典 | 行政数据的35%随机样本 | 1957-1964 |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7 | 1978-1980 | 25.3万 | 0.231 | 0.215 |  |  |
| Yavuz et al. (2019) | 巴西 | IPUMS调查数据库（基于人口普查） | 1980年以前 | 2010 | 2010 | 9.7万 | 0.42 |  |  | 加入家庭成员数量、农村虚拟变量、婚姻状况、教育作为控制变量 |
| 巴拿马 | 1980年以前 | 2010 | 2010 | 4414 | 0.28 |  |  |
| Fan (2016) | 中国 | CFPS, CHARLS调查数据 | 1979前 |  |  |  | 0.43 | 0.26 |  |  |
| 1979后 |  |  |  | 0.51 | 0.37 |  |  |
| Fan et al. (2021) | 中国 | CFPS调查数据 | 1970-1980 | 10980 | 2012, 2014, 2016 | 2012, 2014, 2016 | 0.390 | 0.443 |  | Hekman两步法估计全样本个体收入；直接控制父母和孩子年龄及其二次项；使用父母平均的受教育年限作为终生收入的工具变量 |
| 1981-1988 | 11333 | 0.442 | 0.494 |  |  |
| Yu et al. (2021) | 中国 | RCRE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Rural Economy), CHIP调查数据 | 1966-1981 | 2003–2013 | 2003–2013 | 2.4万父母-儿子对 |  | 0.38 |  |  |
| 1982-1994 |  | 0.55 |  |  |

# 附录Ⅳ 最新研究方向

近些年来，得益于更加可靠全面的大数据的普及应用，代际流动性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单纯地估计代际流动相关性，而是以此为出发点，从各个角度探究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因素，尝试用实证检验模型中的理论机制，从而提出有效可行的政策建议。近10年内，从经济学国际“五大顶级期刊”，以及一些高水平的工作论文来看，代际流动性相关文献的研究前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6]](#footnote-5)

（一）代际流动性与其他社会经济变量的关联

大数据的重要优势之一在于不同数据之间的可连接性。在前文中，我们介绍了拉吉·切蒂（Raj Chetty）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基于美国的个体收入数据进行的关于收入代际流动性及其地区差异的研究。事实上，该团队还将此数据集与其他数据进行连接，包括专利数据、高校学生的数据，以及社交媒体的数据等，展开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实证研究，为我们从代际流动性的角度理解创新与发明、高等教育以及社会资本等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以下我们就对这些研究做简要介绍：

第一，Bell et al.（2019）将美国的专利申请数据、收入数据与学校成绩数据进行匹配，发现美国的专利发明人高度集中于高收入的家庭中；小学时同样成绩优异的学生，其成年后的发明产出与其家庭背景仍高度相关。同时，这项研究还利用不同专利技术领域之间的差异性，识别了孩子幼年成长环境的因素在塑造创新产出方面的代际流动性中的作用。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很多天赋较高的孩子因其家庭背景的限制而没有得到后续的培养和上升空间，没有发挥出其在发明创造方面的禀赋，这本身是一种经济机会不平等的表现，也会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Chetty et al.（2020b）将美国各高校就读学生的信息与其父母的收入信息相匹配，考察了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塑造代际流动性方面的作用。他们发现，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成年后的收入差异，主要是由父母的收入与孩子所就读的大学之间的关联所解释；美国的大学在学生家庭背景上呈现高度的分割（segregation），在给定SAT/ACT考试分数不变的情况下，高收入家庭的孩子进入顶尖大学的概率仍然远高于中低收入家庭；改善这种分割的状态有助于提高美国社会的代际流动性。事实上，这项研究对于理解我国的高考和高校体系在塑造社会流动性方面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这方面值得在我国得到更深入的实证研究。

第三，社会资本也是塑造代际流动性的重要因素。在本文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论框架中，代际传承的禀赋中就包含了社会资本。Chetty et al.（2022a, b）使用社交媒体Facebook上的朋友关系的信息，利用网络结构的实证分析方法，在美国的邮政编码地区层面界定了若干种对于社会资本的度量，并考察了社会资本与地区层面的代际流动性之间的关联，发现高SES和低SES的人之间的连接性（connectedness）越强的地方表现出显著更强的代际流动性。这项研究为关于社会互动、流动性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探究在视角和方法上做出了重大的创新，也给未来的研究指出了可能的发展方向。

（二）多代人间的代际流动性

基于Becker and Tomes（1979）的两代人模型，大多数研究代际流动性的实证文献都仅仅关注两代人之间的代际流动性，尤其是父亲-儿子之间。但是基因禀赋、财富积累、家庭文化、社会网络等影响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家庭特征具有很强的持久性，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在家庭中的传承不仅仅是一阶自回归过程（Mare, 2011; Solon, 2018）。在这个问题上，Stuhler（2012）在模型中引入市场中的运气因素、技能的多维度特征、祖父母对孙辈的直接影响等，发现长期的多代之间的流动性会低于一阶自回归过程的假定所预测的水平。

Lindahl et al.（2015）、Braun and Stuhler（2018）、Long and Ferrie（2018）、Colagrossi et al.（2020）和 Modalsli（2021）使用多代人数据分别研究了收入、教育和职业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代际相关性，涵盖美国、英国、德国、瑞典等多个国家，均发现即使控制了父辈特征，祖辈以及更久远的祖辈特征依然会对子代特征产生影响，所以仅使用两代人的实证研究低估了代际持久性，从而高估了代际流动性。而且，Adermon et al.（2021）使用整个扩展家庭的数据，发现除了直系亲属以外，父母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旁系家庭成员的特征（教育成就）同样与个体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婚姻匹配在代际流动中的作用。

此外，Clark et al.（2015）、Clark and Cummins（2015）、Barone and Mocetti（2016）和Hao（2021） 等使用姓氏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志，利用历史数据将个体根据姓氏进行匹配亲缘匹配，同样证实了很强的多代持久性的存在。使用姓氏作为代际联系的问题在于，同一个姓氏但没有亲缘关系的个体，可能受到相同的居住地、种族等家族以外的共有特征影响，因此可能高估代际相关性。因此实证文献中通常选择比较罕见的姓氏以缓解这一问题。Güell et al.（2015）使用横截面数据，将罕见姓氏对于个体教育成就的解释力作为姓氏的信息含量，同样发现很强的代际相关性。

（三）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教育与偏好

禀赋继承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决定代际流动性的重要因素，其中“禀赋”本身的内涵也非常丰富。禀赋不仅包括种族、能力、健康状况等特征的基因遗传，也包括家庭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人际关系、家庭文化（比如目标、观念等）（Becker and Tomes, 1979）；而人力资本投资也不仅限于以金钱形式进行，父母的时间投入和言传身教都会积累子代的人力资本。因此，来自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的个体，不仅享有经济资源的直接优势，而且还会在其他方面受到家庭背景的间接影响，而后者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前者。例如，Lefgren et al.（2012）发现父子代际收入相关性中至多有37% 是由家庭金融资产的直接因果作用导致的。

Adermon et al.（2021）认为，家庭成员的影响可以通过货币或和非货币投资途径发挥作用，比如与儿童度过的优质时间，以及通过家庭传统和行为规范、言传身教等途径影响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类似的，Falk et al.（2021）通过在德国进行随机控制试验，发现来自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的孩子更聪明、更耐心、更利他主义、风险偏好的倾向更小，从而实现更好的健康状况、更少参与风险行为、实现更高的教育水平，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且，机制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观点：父母教育和家庭收入直接影响父母的人力资本投资数量和质量，教育水平高、收入高的父母，倾向于多陪孩子，且教育方式更倾向于奖励而不是惩罚，而且亲子互动时间更加高效。在《爱、金钱和孩子》一书中，Doepke and Zilibotti（2019）对“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这一心理学概念在代际流动性中扮演的作用进行了理论模型和实证的研究，他们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长更少地使用专制型的教养方式，而更多地使用具有更高反应性教养方式，这有利于子代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7]](#footnote-6)

此外，利用挪威的领养儿童数据的诸多研究也表明，先天基因因素和后天家庭环境培养对于个体的社会经济偏好、行为都会产生深远影响，比如受教育水平（Björklund et al.，2006），选举参与度（Cesarini et al., 2014），犯罪行为（Hjalmarsson and Lindquist, 2013），创业行为（Lindquist et al., 2015），长期健康状况（Lindahl et al., 2016），以及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偏好等（Black et al., 2017）。Ager et al.（2021）使用美国内战废除奴隶制作为外生冲击，发现相对于奴隶数量更少的富裕家庭而言，南方大奴隶主损失惨重，但是他们的子辈以及孙辈的财产水平恢复更快，主要是通过联姻以及与其他精英家族的社会网络加速了财产积累，而其他企业家精神和技能水平等遗传特征作用并不显著。

（四）区分环境和基因的相对作用

早期文献使用同一家庭中兄弟姐妹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结果的相关性，来代表家庭以及社会背景（观测到的和不可观测的因素）对于决定个体成年表现中所发挥的作用。如果家庭和社会背景的作用大，则兄弟姐妹的表现应该高度相关；反之，则该相关性应该与总体中随机匹配的两个人的相关性没有显著差异（Solon, 1999）。同时，该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兄弟姐妹所共享的不仅仅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也包括父母特征、家庭文化，以及学校和居住环境等共同因素。另一方面，家庭特有的但是即使对于兄弟姐妹也存在异质性的因素没有被考虑，比如并不完全的相同的基因遗传，由于出生时间、出生次序不同而导致的资源配置差异等（Rosenzweig and Zhang, 2009）。[[8]](#footnote-7)

此外，自Sacerdote（2007）以来，很多文献使用领养儿童数据来区分基因因素和环境因素在决定代际相关性中的相对重要性，考察的结果变量包括教育和收入水平（Björklund et al., 2006; Björklund et al., 2007; Sacerdote, 2007），风险偏好和投资组合选择（Sacerdote, 2007; Fagereng et al., 2021），以及财富积累（Fagereng et al.，2021）。在文献中被普遍接受的是，二者均会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对于不同的结果变量，基因遗传和后天家庭环境的相对作用大小存在异质性。比如Adermon et al.（2021）使用瑞典领养儿童数据，发现教育成就的代际相关性主要是由父母的基因遗传决定的，家庭环境因素影响仅仅在30%—40%左右。Fagereng et al.（2021）使用相同的数据，发现对于（金融）资产积累而言，基因的作用更大，是环境影响的2倍左右；对于金融风险偏好而言，家庭环境因素作用很大，而基因作用不大；而且基因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存在负相关，即基因禀赋更差的父母会通过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或者财富直接转移来弥补孩子的先天劣势。

（五）成长环境的因果效应

社区层面的阶层分割被认为是影响社会代际流动性的重要因素，未成年时期所在社区的环境如何影响个体实现阶层上升的概率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在理论层面，Durlauf and Seshadri（2018）构建理论模型，刻画了社区层面的分割现象在解释“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中的作用。在实证研究上，Chetty et al.（2014b）系统估计了美国全国范围内通勤区层面的代际收入向上流动性（AUM），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地理单元细化到县级层面和普查区层面（Chetty et al., 2018）。相比于以往侧重于跨国比较的文献，这一系列文献聚焦于国家内部的代际流动性差异分析，使用一个国家内部统一的税收数据，口径一致且覆盖全面，地区间具有可比性。

在此基础上，Chetty and Hendren（2018a，2018b）和Chetty et al.（2016a）分别利用美国家庭跨区域搬家的准自然实验和美国MTO项目数据，证实了童年时的成长环境对于儿童成年表现（大学入学率、收入等）的影响，在实证上区别了因果效应和类聚效应。而且，社区的因果效应在划分很细的地理单元中发挥作用：条件于自己所在的人口普查区中的贫困率，仅仅1英里以外的普查区的特征对于儿童预期表现几乎没有任何解释力（Chetty et al., 2018）。而且在23岁之前，儿童在高质量社区度过的时间每增加1年，其AUM可以提高4个百分点。这些高质量、代际流动性高的社区在多个方面具有一致的特征：居住区分割现象弱，收入不平等水平低，初等学校质量高，社会资本水平高，且家庭稳定性高（Chetty et al., 2018）。基于Chetty and Hendren（2018a，2018b）的估计，美国国内代际收入向上流动性的地区差异中有62%可以由不同地区的社区环境的因果效应解释。[[9]](#footnote-8)

类似地，Bergman et al.（2019）在西雅图和King County进行随机控制试验，发现大部分低收入家庭并不是按类聚效应所预测的那样偏好居住在低流动性的地区；相反，普遍存在的基于收入的居住分隔现象主要是由于租房搜寻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如果对低收入家庭提供针对性帮助，比如提供租房搜寻辅助、为家庭与房东联系提供便利、提供定制的短期金融协助等，都可以显著减少家庭所面临的障碍，促使低收入家庭搬到高流动性地区，提高政府住房补贴的效率，从而提高代际流动性，缩小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1. Adermon, A., L. Mikael, and P. Mårten, “Dynastic Human Capital, Inequa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1, 111(5), 1523-48.
2. Adsera, A., “Vanishing Children: From High Unemployment to Low Fertilit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2), 189-193.
3. Ager, P., L. Boustan, and K. Erikss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of a Large Wealth Shock: White Southerners After the Civil Wa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1, 111(11), 3767-94.
4. Alesina, A., S. Hohmann, S. Michalopoulos, and E. Papaioannou,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Africa”, *Econometrica*, 2021, 89(1), 1-35.
5. Almond， D, and B. Mazumder, “Fetal Origins and Parental Responses”,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13, 5(1), 37–56.
6. Altonji, J. G., and T. A. Dunn,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Family Income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of Relativ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1.
7. Antonovics, K. L., and A. S. Goldberger, “Does Increasing Women's Schooling Raise the Schooling of the Next Generation?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 95(5), 1738-1744.
8. Atkinson, A. B., A. K. Maynard, and C. G. Trinder, *Parents and Children: Incomes in Two Generations*. London: Heinemann, 1983.
9. Barone, G., and S. Mocetti,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Very Long Run: Florence 1427-2011”, Bank of Italy Temi di Discussione Working Paper, 2016, No. 1060.
10. Barth, D., N. W. Papageorge, and K. Thom, “Genetic Endowments and Wealth Inequa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0, 128(4), 1474-1522.
11. Becker, G. S., “A Theory of Marriage: Part I”,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3, 81(4), 813-846.
12. Becker, G. S., “A Theory of Marriage: Part II”,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2), Part 2, S11-S26.
13. Becker, G. S., “Altruism in the Family and Selfishness in the Market Place”, *Economica*, 1981, 48(189), 1-15.
14. Becker, G. S., and H. G. Lewi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3, 81(2), S279–S288.
15. Becker, G. S., and N. Tomes, “Child Endowments and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6, 84(4), S143-S162.
16. Becker, G. S., and N. Tomes, “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86, 4(3), Part 2, S1-S39.
17. Becker, G. S., and N. Tomes, “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86, 4(3), Part 2, S1-S39.
18. Behrman, J. R., and M. R. Rosenzweig, “Does Increasing Women's Schooling Raise the Schooling of the Next Gene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2, 92(1), 323-334.
19. Bell, A., R. Chetty, X. Jaravel, N. Petkova, and J. van Reenen, “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ca? The Importance of Exposure to Innov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9, 134(2), 647-713.
20. Bell, B., J. Blundell, and S. Machin, “Where Is the Land of Hope and Glor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3, 125(1), 73-106.
21. Bergman, P., R. Chetty, S. DeLuca, N. Hendren, L. F. Katz, and C. Palmer, “Creating Moves to Opportunity: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Barriers to Neighborhood Choice”, NBER Working Paper, 2019, No. w26164.
22. Bingley, P., K. Christensen, and V. M. Jensen, “Parental Schooling and Child Development: Learning from Twin Parents”, The Danish National Centre for Social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9.
23. Björklund, A., M. Lindahl, and E. Plug, “The Origins of Intergenerational Associations: Lessons from Swedish Adoption Dat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121(3), 999-1028.
24. Björklund, A., M. Jäntti, and G. Solon, “Nature and Nurture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Evidence from Swedish Children and Their Biological and Rearing Parents”,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2007, 7(2).
25. Björklund, A., and K. G. Salvanes, “Education and Family Background: Mechanisms and Policies”,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2011, 3, 201-247.
26. Black, S. E., and P. J. Devereux, “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2011, 4, 1487-1541.
27. Black, S. E., P. J. Devereux, and K. G. Salvanes, “Under Pressure? The Effect of Peers on Outcomes of Young Adult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3, 31(1), 119-153.
28. Black, S. E., P. J. Devereux, P. Lundborg, and K. Majlesi, “On the Origins of Risk-Taking in Financial Markets”, *Journal of Finance*, 2017, 72(5), 2229-2278.
29. Blanden, J., “Essay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Its Variation Over Time, Place and Family Structure”, University of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nited Kingdom), 2005.
30. Boserup, S. H., W. Kopczuk, and C. T. Kreiner, “Intergenerational Wealth Mobility: Evidence from Danish Wealth Records of Three Generation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mimeo, 2013.
31. Branigan, A. R., K. J. McCallum, and J. Freese, “Variation in the Heritability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 International Meta-Analysis”, *Social Forces*, 2013, 92(1), 109-140.
32. Bratberg, E., Ø. A. Nilsen, and K. Vaage,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in Norway: Levels and Trend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107(3), 419-435.
33. Bratberg, E., J. Davis, B. Mazumder, M. Nybom, D. D. Schnitzlein, and K. N. Vaage, “A Comparison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Curves in Germany, Norway, Sweden, and the U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7, 119(1), 72-101.
34. Braun, S. T., and J. Stuhler, “The Transmission of Inequality across Multiple Generations: Testing Recent Theories with Evidence from Germany”, *Economic Journal*, 2018, 128(609), 576-611.
35. Browning, M., P. Chiappori, and Y. Weiss, *Economics of the Fami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36. Cesarini, D., M. Johannesson, and S. Oskarsson, “Pre-Birth Factors, Post-Birth Factors, and Voting: Evidence from Swedish Adoption Dat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4, 108(1), 71-87.
37. Chadwick, L., and G. Solo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among Daugh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2, 92(1), 335-344.
38. Charles, K. K., and E. Hurst, “The Correlation of Wealth across Gener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 111(6), 1155-1182.
39. Chetty, R., N. Hendren, P. Kline, E. Saez, and N. Turner, “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Land of Opportunity? Recent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a, 104(5), 141-47.
40. Chetty, R., N. Hendren, P. Kline, and E. Saez, “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b, 129(4), 1553-1623.
41. Chetty, R., N. Hendren, and L. F. Katz,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Better Neighborhoods on Children: New Evidence from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4), 855-902.
42. Chetty, R., 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come and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1-2014”, *JAMA*, 2016b, 315(16), 1750-1766.
43. Chetty, R., D. Grusky, M. Hell, N. Hendren, R. Manduca, and J. Narang, “The Fading American Dream: Trends in Absolute Income Mobility Since 1940”, *Science*, 2017, 356(6336), 398-406.
44. Chetty, R., J. N. Friedman, N. Hendren, M. R. Jones, and S. R. Porter, “The Opportunity Atlas: Mapping the Childhood Roots of Social Mobility”, NBER Working Paper, 2018, No. w25147.
45. Chetty, R, and N. Hendren, “The Impacts of Neighborhood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 Childhood Exposure Effec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8a, 133(3), 1107-1162.
46. Chetty, R., and N. Hendren, “The Impacts of Neighborhood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I: County-Level Estim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8b, 133(3), 1163-1228.
47. Chetty, R., N. Hendren, M. R. Jones, and S. R. Porter, “Race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a, 135(2), 711-783.
48. Chetty, R., J. N. Friedman, E. Saez, N. Turner, and D. Yagan, “Income Segreg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cross Colle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b, 135(3), 1567-1633.
49. Chetty, R. et al., “Social Capital I: Measurement and Associations with Economic Mobility”, *Nature*, 2022a, 608(7921), 108-121.
50. Chetty, R., et al., “Social Capital II: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Connectedness”, *Nature*, 2022b, 608(7921), 122-134.
51. Clark, G., and N. Cummins, “Intergenerational Wealth Mobility in England, 1858–2012: Surnames and Social Mobility”, *Economic Journal*,2015, 125(582), 61-85.
52. Clark, G., N. Cummins, Y. Hao, and D. D. Vidal, “Surnames: A New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15, 55, 3-24.
53. Colagrossi, M., B. d’Hombres, and S. V. Schnepf, “Like (Grand) Parent, Like Child? Multigenerational Mobility Across the EU”,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20, 130, 103600.
54. Connolly, M., M. Corak, and C. Haeck,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between and with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9, 37(2), S595-S641.
55. Corak，M., and A. Heisz, “The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and Income Mobility of Canadian Men: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Income Tax Data”,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99, 34(3), 504-533．
56. Corak, M., “Do Poor Children Become Poor Adults? Lessons from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In: Creedy, J. and Kalb, G. (ed.), *Dynamics of Inequality and Poverty (Research on Economic Inequality, Vol. 13)*.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Bingley, 2006, 143-188.
57. Corak, M., “Income Inequalit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3, 27(3), 79-102.
58. Corak, M., M. J. Lindquist, and B. Mazumder, “A Comparison of Upward and Downwar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Canada,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abour Economics*, 2014, 30, 185-200.
59. Deutscher, N., and B. Mazumder,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Australia: National and Regional Estimates Using Administrative Data”, working paper, 2019.
60. Doepke, M., and F. Zilibotti, *Love, Money, and Parenting: How 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61. Durlauf, S. N., and A. Seshadri, “Understanding the Great Gatsby Curve”,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18, 32(1), 333-393.
62. Eriksen, J., and M. D. Munk,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Danish Evidence”, *Economics Letters*, 2020, 189, 109024.
63. Fagereng, A., M. Mogstad, and M. Rønning, “Why Do Wealthy Parents Have Wealthy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1, 129(3), 703-756.
64. Falk, A., F. Kosse, P. Pinger, H. Schildberg-Hörisch, and T. Decker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Inequalities in Children’s IQ and Economic Preferen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1, 129(9), 2504-2545.
65. Fan, Y.,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Persistence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6, 41, 299-314.
66. Fan, Y., J. Yi, and J. Zhang, “Risin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Persistence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21, 13(1), 202-30.
67. Güell, M., J. V. Rodríguez Mora, and C. I. Telmer, “The Informational Content of Surnames, the Evolu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Assortative Mat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5, 82(2), 693-735.
68. Güell, M., M. Pellizzari, G. Pica, and J. V. Rodríguez Mora, “Correlating Social Mobility and Economic Outcomes”, *Economic Journal*, 2018, 128(612), F353-F403.
69. Haider, S. J., *Econometric Studies of Long-run Earnings Inequalit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8.
70. Hao, Y.,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1645–2012: A Surname Study”,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International*, 2021, 1(3), 233-243.
71. Heidrich, 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Sweden: A Reg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7, 30(4), 1241-1280.
72. Hjalmarsson, R., and M. J. Lindquist, “The Origins of Intergenerational Associations in Crime: Lessons from Swedish Adoption Data”, *Labour Economics*, 2013, 20, 68-81.
73. Jayachandran, S., and A. Lleras-Muney, “Life Expectancy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s: Evidence from Maternal Mortality Declin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1), 349-397.
74. Kiser, C. V., and P. K. Whelpton,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Affecting Fertility. XI. The Interrelation of Fertility, Fertility Planning, and Feeling of Economic Security”,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1951, 29(1), 41-122.
75. Kremer, M., “How Much Does Sorting Increase Inequ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1), 115-139.
76. Lam, D., “Marriage Markets and Assortative Mating with Household Public Goods: Theoretical Results and Empiric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88, 462-487.
77. Lefgren, L., D. Sims, and M. J. Lindquist, “Rich Dad, Smart Dad: Decompos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nco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2, 120(2), 268-303.
78. Li, H., M. Rosenzweig, and J. Zhang, “Altruism, Favoritism, and Guilt in the Allocation of Family Resources: Sophie’s Choice in Mao’s Mass Send-Down Move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0,118(1), 1-38.
79. Lillard, L. A., and M. R. Kilburn,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Links: Sons and Daughters.* RAND, 1995.
80. Lindahl, M., E. Lundberg, M. Palme, and E. Simeonova, “Parental Influences on Health and Longevity: Lessons from a Large Sample of Adoptees”, NBER Working Paper, 2016, No. w21946.
81. Lindahl, M., M. Palme, S. S. Massih, and A. Sjögren, “Long-Term Intergenerational Persistence of Human Capital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Four Generation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15, 50(1), 1-33.
82. Lindquist, M. J., J. Sol, and M. Van Praag, “Why Do Entrepreneurial Parents Have Entrepreneurial Childre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5, 33(2), 269-296.
83. Long, J., and J. Ferrie, “Grandfathers Matter (ed): Occupational Mobility across Three Generations in the US and Britain, 1850–1911”, *Economic Journal*, 2018, 128(612), F422-F445.
84. Mare, R. D., “A Multigenerational View of Inequality”, *Demography*, 2011, 48(1), 1-23.
85. Mazumder, B., “Estimat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and Rank Association in the US: Overcoming the Current Limitations of Tax Data”, working paper, 2015.
86. Mitnik, P., V. Bryant, M. Weber, and D. B. Grusky, “New Estimates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Using Administrative Data”, working paper, 2015.
87. Modalsli, J., “Multigenerational Persistence: Evidence from 146 Years of Administrative Data”,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21, 1018-9825R2.
88. Murray, C., R. G. Clark, S. Mendolia, and P. Siminski, “Direct Measures of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for Australia”, *Economic Record*, 2018, 94(307), 445-468.
89. Nybom, M., and J. Stuhler, “Heterogeneous Income Profiles and Lifecycle Bia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Estimation”,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16, 51(1), 239-268.
90. Pronzato, C., “An Examination of Paternal and Maternal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chooling”,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2, 25(2), 591-608.
91. Rosenzweig, M. R., and J. Zhang, “Do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Induce Mor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wins, Birth Weight and China's ‘One-Child’ Polic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9, 76(3), 1149-1174.
92. Sacerdote, B., “How Large Are the Effects from Changes in Family Environment? A Study of Korean American Adopte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 122(1), 119-157.
93. Schnelle, K.,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Norway: Transition Probabilities and Directional Rank Mobility”, MS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Bergen, 2015.
94. Solon, 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393-408.
95. Solon, G., “A Model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Variation over Time and Place”, *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2004, 2, 38-47.
96. Solon, G.,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Labor Market”, In: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 3, Elsevier, 1999, 1761-1800.
97. Solon, 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Routledge, 2018, 497-500.
98. Stiglitz, J. 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Among Individuals”, *Econometrica*, 1969, 382-397.
99. Stuhler, J., “Mobility Across Multiple Generations: The Iterated Regression Fallacy”, IZA Discussion Papers, 2012.
100. Yavuz, H. B., F. Pastore, and Ö. T. Doruk,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 Assessment fo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ZA Discussion Papers, 2019.
101. Yu, Y., Y. Fan, and J. Yi, “One-Child Policy, Differential Ferti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nequality in China”, working paper, 2021.
102. Yu, Y., L. Gong, and J. Yi, “Globalization Raises Intergenerational Inequality Transmission in Chinese Villages”, working paper, 2022.
103. Zhang, H., X. Qin, and J. Zhou, “Do Tiger Moms Raise Superior Kids? The Impact of Parenting Style on Adolescent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0, 63, 101537.

**注：该附录是期刊所发表论文的组成部分，同样视为作者公开发表的内容。如研究中使用该附录中的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附录下载出处**。

1. 例如，个体特征影响了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生产率，进而影响了工资。婚姻的收益来源于配偶双方可以根据生产率上的比较优势来进行劳动力市场-家庭生产间的专业化生产：市场工资水平相对高的个体选择就业，获得工资收入，购买市场交易品，而工资水平相对低的个体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把市场交易品与家庭生产时间结合，产出可消费的家庭生产品（唯一的效用来源），从而最大化家庭总效用。在这种情况下，婚配市场会表现出负向选择的特征，即工资水平高的个体倾向于与工资水平低的个体组建家庭。关于家庭的经济功能与婚姻匹配之间的关系，请参阅Browning et al.（2014）。

 而另一方面，在配偶间劳动力市场生产率的比较优势和配偶双方私人消费的基础上，Lam（1988）又引入家庭公共品的消费，同样由市场交易品和配偶双方的家庭生产时间作为投入要素，并且假设不同收入水平的个体对于家庭公共品具有不同的偏好。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倾向于与收入水平类似、偏好类似的个体组建家庭以最大化从私人消费和家庭公共品消费中获得的效用，即正向选择。 [↑](#footnote-ref-0)
2. 此外，Chetty et al.（2014b）发现，仅使用父母一方收入与使用父母家庭收入的RRS估计值差距不大（下降10%），可能是因为双亲家庭与单亲家庭的孩子的平均收入排序表现相近。 [↑](#footnote-ref-1)
3. 虽然相比于IGE，RRS对于零收入的处理和收入计算年龄跨度的选择更加不敏感，但是无论IGE还是RRS，估计值对于零收入的处理和收入计算年龄跨度的选择的稳健性一直是文献的关注重点，而对于最优处理方法至今也没有定论。在数据允许的情况下，很多文献选用不同的收入定义标准、零收入处理方法和收入计算的年龄跨度作为稳健性检验。例如，Mazumder（2015）使用美国PSID收入数据，涵盖父辈年龄33—47岁，子代年龄37—43岁，结果显示随着计算收入的年份增加，IGE上升。 [↑](#footnote-ref-2)
4. Chetty et al.（2014b）发现，相比于使用子代家庭收入估计的RRS而言，仅使用个体收入估计的RRS明显下降，而且女性后代的下降幅度明显高于男性后代（分别为26%和6%），可能是因为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女性更可能与来自高收入家庭的男性婚配，从而退出劳动力市场。 [↑](#footnote-ref-3)
5. 除了性别差距，种族歧视也是影响很多国家收入不均等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Chetty et al.（2020a）发现不同种族之间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也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美国，亚裔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最高，其次是白人和西班牙裔，而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流动性最低。亚裔孩子的平均收入排序远高于白人孩子，主要是由于第一代移民通常具有较高的能力但是收入被低估。 [↑](#footnote-ref-4)
6. “五大顶级期刊”包括（按首字母排列）：*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和*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footnote-ref-5)
7. Zhang et al.（2020）基于中国初中生的样本，对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子女学习成绩、认知能力和若干方面的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进行了考察。 [↑](#footnote-ref-6)
8. 部分文献利用双胞胎数据，尝试从生物学角度解释经济行为的基因遗传。通过区分同卵（基因相同）和异卵双胞胎，可以将基因遗传与家庭环境特征分离。Branigan et al.（2013）发现，教育成就的可遗传性大约为40%；Barth et al.（2020）使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中提供的与特定经济行为相关的DNA碱基对位点数据，来衡量代际相关性中的基因遗传成分，发现基因与财富积累高度相关，主要通过所实现的教育水平，以及储蓄行为和投资组合选择发挥作用。 [↑](#footnote-ref-7)
9. 根据Chetty et al.（2018b）的估计，社区的房价与当地的社会流动性之间并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除了房价以外，存在其他因素阻碍低流动性社区的家庭迁移到高流动性社区，比如信息摩擦等。 [↑](#footnote-ref-8)